

汉语流传欧洲史

Giorgio Casacchia 卡萨齐 著
Mariarosaria Gianninoto 莎丽达

学林出版社

汉语流传欧洲史

Giorgio Casacchia 卡萨齐 著
Mariarosaria Gianninoto 莎丽达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流传欧洲史/(意)卡萨齐等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486-0203-3

I. ①汉… II. ①卡… III. ①汉语—语言史—研究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7197 号

汉语流传欧洲史



- 作 者——卡萨齐 Giorgio Casacchia
莎丽达 Mariarosaria Gianninoto
责任编辑——陈翔燕
整体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14.5
字 数——19 万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203-3/H·17
定 价——3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汉语的历史源远流长,汉语的对外传播史也堪称悠久漫长。可以想像,商周秦汉王朝在征服异族、统一国家、拓展疆域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汉语的推广和汉文化的传播。魏晋至唐宋不仅是中国社会架构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化主体生成的关键阶段。几乎在广纳外来语言和文化的同时,中国也向世界展示了本土语言文化的非凡魅力和持久张力。由于国力鼎盛、文化强势,这一时期的汉语传播力度无疑十分强劲。据史料记载,唐代居留中国的蕃民、胡商和胡奴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族繁杂,这些人显然是当时学习汉语、使用汉语、传播汉语的生力军。不过,当时的汉语传播尽管声势赫赫,但波及范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太广,主要限于东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另外,这个时期的汉语对外传播似乎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传习,我们几乎看不到当时域外人士进行汉语分析的资料。史料显示,汉魏六朝的佛经译者大多是胡僧,他们对梵语的特点往往津津乐道,而对汉语的特点则似乎有点漠然置之。

从元朝开始,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持续升温,汉语成了欧洲人视野中的一道独特的语言风景,汉语的传播也立时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巨浪。而首先掀起这股巨浪的力士不是别人,正是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其实早在唐代,基督教就已与中华文化初步结缘。盛唐之际,被视为东方基督教(拜占庭)一支的景教就飘然来到中土,并流行了约200余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等诸多环境因素的制约,景教并未在中国的社会肌体和文化形态中留下多少印迹。但是,透过留存至今的几十篇汉语景教文典(颂文和经文),我们仍能感受到唐代汉语西传的别样风情。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欧洲对中国开展的传教活动绝非

唐代景教的复活或再版,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的命运。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欧洲的传教士都不失为近代汉语传播的开路先锋和头号功臣。在“将上帝的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神圣使命的感召下,一拨一拨的传教士志愿来到神秘的东方古国,开始了奇异的语言文化之旅。在传教士之后,西方的商人、学者、冒险家和外交官也纷至沓来。他们出于种种的需要和目的,一再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汉语上,从而引发了汉语学习与研究的阵阵热潮。在这阵阵热潮的推动下,一批批的汉语教材和研究著作应运而生,承担起了汉语传播的历史重任。由于历史的变迁、语言的阻隔、用途的狭窄和传布的限制,这些教材和著作在后来大多束之高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致国内外学界知之甚少,行将湮没无闻,成为过眼云烟。自上世纪末以来,尤其是跨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重启和深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重视起对汉语域外传播史的研究,于是沉寂化为喧嚣。在汉语域外传播史中,汉语流传欧洲的历史虽然短暂却极其红火,影响也十分深远。正因如此,近年来不少出版社纷纷将当年出自欧洲人之手的一些汉语教材和研究著作加以译介出版,诸如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马若瑟的《汉语札记》、雷慕萨的《汉文启蒙》、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艾约瑟的《官话口语语法》、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等。这种译介工作虽极具价值和意义,但并不能勾勒出汉语在欧洲流传的整个历史进程,因而不无缺憾。就在人们纠结于这种缺憾之际,由卡萨齐(Giorgio Casacchia)教授和莎丽达(Mariarosaria Gianninoto)副教授共同编撰的《汉语流传欧洲史》悄然问世了。

毫无疑问,《汉语流传欧洲史》是一部真正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著作。任何对汉语流传欧洲的历史状况感兴趣的人,只要借助这部资料翔实、条理清楚、分析细致的著作,都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收益。

其一,真切地捕捉近代汉语的历史信息。几百年来,西方人士为

我们积攒并保留了丰富的近代汉语语料。这些语料既涉及书面语,又涉及口语,既涉及共同语,又涉及方言。由于当事人普遍具有良好的语言描写功底,这些语料往往客观而翔实,其中流露的语言信息往往也就更加确凿可信,后人完全可以据此进行全方位的语言研究。例如,林林总总的双语词典中就蕴藏着特别丰富的语音信息、词汇信息和文字信息,这些信息对近代语音史、词汇史和文字史研究都是无价之宝,值得国内学者备加珍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采用了拉丁字母注音法,这些语料所反映的字词读音就显得尤其真切可辨,其准确度和精细度是本土语料根本无法比拟的。也许基于上述认识,罗常培当年曾专门作有《耶稣会士对音韵学的贡献》一文,对西方人士的相关做法大加肯定。

其二,全新地感受西人眼中的汉语和汉字面目。毋庸置疑,中国古代语言学家对汉语和汉字的面貌或多或少是有些认识的,但这种认识往往建立在自我感知的基础上,因为缺乏比较和观照,难免主观和失真。而西方人士由于语言背景不同,对汉语的基本面貌就特别敏感,自然也就十分注意对汉语、汉字性质和特点的揭示,并且往往能发中国学者之未发,从而给人带来全新的感觉。例如,利玛窦不仅注意到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特性,同时也指出了汉字的单音节性和书写上的非凡包容性。对欧洲人倍感困惑的汉语语法特点,利玛窦还作了概要的揭示:“这种文字没有冠词、格、数、时态、语式的变化,而使用一些特定的副词来弥补这种缺陷,而且表达效果还很好。”难能可贵的是,在不断感知汉语特点的过程中,不少西方人士逐渐舍弃了拉丁语式的评判标准,逐渐以一种包容甚至欣赏的理性态度来看待汉语。如果说在利玛窦、曾德昭等人的眼中,汉语还是一种模棱两可、不精确的语言的话,那么,到了瓦洛、马若瑟等辈的著作中,汉语已经被视为一种有规则的、可以加以详细阐述的语言了。

其三,历史地看待汉语和汉字的研究架构。在确立汉语的研究框架方面,中西方语言学颇异其趣: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强调的是语义,而

欧洲的传统语言学则凸显的是语形。秉承自身的语言研究传统,欧洲学者将固有的理念和框架置于汉语之上,给汉语研究确立了一种新的范式,这一点在语法研究中体现得尤为分明。可以说,现有的汉语语法研究框架就是建立在西方语法体系基础之上的,至今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词典尤其是双语词典的编撰方面,西方人士同样树立了标杆。他们的最大贡献在于两大创新:一是用拉丁字母标注汉字读音并发明声调符号,二是采用音序检字法来取代传统的部首检字法。叶尊孝的《汉字西译》基本奠定了汉语-欧洲语双语词典的模式,以致成为后来众多双语词典竞相模仿的范本。在汉字注音法方面,欧洲学者所作的探究诚可谓筚路蓝缕。从罗明坚、利玛窦到金尼阁,再到后来的瓦洛、威妥玛,他们代代相传,不断改进,直启清末切音字运动,对汉语拼音方案影响至深。另外,西方人士还引进了新型的方言研究模式,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方言学也是深得其惠。

其四,清晰地了解西方汉语研究的演进轨迹。西方人士起初只把汉语当作一种布道、经商、外交的工具,因此早期汉语研究充其量是一种实用的研究。后来,他们逐步摈弃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将汉语视为人类语言一种重要的类型,由此极大地提高了汉语研究的科学性。弗兰西斯·培根等学者就认为汉语代表了一种语言模型,大力提倡将汉语融入探寻世界语的研究之中。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法、英等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汉语研究机构,宣告了汉学在欧洲的诞生。自此,西方式的汉语研究渐趋上风并一直主导了中国语言学。汉语语法的演进恰是一个有力的明证。汉语语法研究先以拉丁语法体系作为描写框架,之后又转到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德语的语法体系,最后则以英语和法语的语法体系为主。这个看似不经意的调整恰恰表明了西方学者对汉语语法特点的把握、认同和尊重。正因如此,他们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屡有创获: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第一个把量词从助词里分离出来,并使之构成一个单独的类别;雷慕萨的《汉文启蒙》一反拉丁语式的语法分析,不再用格和变位来描述汉语的名词和

动词；儒莲的《汉文指南》一再重申词语的位置是汉语语法的中心。熟悉汉语语法学史的人不难发现，上述进程与中国现代语法学之路几乎是如出一辙。

可以说，《汉语流传欧洲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欧洲学者在汉语研究领域的不懈探索和惊人成就，同时也能够促使我们更理性地对待欧洲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之间的深切关系。

附带指出的是，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来自意大利，一位来自法国，都是学贯中西的汉学家。我们惊喜地发现，在汉语流传欧洲的历史进程中，意大利和法国称得上是两方重镇，人才济济，贡献尤多，前者如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门多萨等，后者如巴范济、金尼阁、马若瑟、雷慕萨等。我想，这也许是激发上述两位学者创作本书的动因之一吧。

期待这部著作给国内语言学界带来全新的体验与强烈的震撼！

苏州大学 王建军

2011年夏于五方庐

引 言

汉语在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流传已经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现象了。

在如今的欧洲，汉语已经成为学习人数最多的一门外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同外界的交流和联系，这一切都推动了欧洲国家高校和私人机构的汉语学习和研究。在欧洲的很多国家，汉语以不同级别的形式出现，汉语的学习无论是从教学的角度，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都和语义学方面的研究一样，渐渐发展和壮大。

对汉语和关于汉语知识学习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我们可以在明代末期以来传教士和旅行家的作品中找到关于汉语的描述。那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可以看作是欧洲第一批语言学专家。他们对汉语在欧洲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是第一批将汉语著作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人，他们将汉语思想、文学和历史介绍给西方的普通读者和学者。在汉语研究领域，传教士们将汉语知识整理成系统的语法和教科书，他们也将汉语转化成拉丁语字母，并编纂了最早的汉语-欧洲语言词典。

由于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密切，一方面促进了西方汉学的产生，另一方面向中国引入了如今大家已经不熟悉的语言学习方法和理论（比如语法学习），如果是按照中国传统创立这些理论的话，这些理论和方法如今可能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最具创新特色的综合知识。

在清朝时期，最早教授汉语语言文学的机构和教堂在各处建立。世俗的汉学产生在 17 和 18 世纪，而西方正规的学院教授汉学开始在 19 世纪初。

最早的欧洲汉学家编写了相当数量的汉语学习手册和双语字典，他们希望将汉语知识按照西方语言的某些规律编辑整理，以便欧洲人比较容易接受，他们创立了最早的比较语言学，将西方语言的分类方法运用到汉语上，但同时也为汉语独有的特色知识创建了新的分类，向欧洲介绍了最早的汉语传统语言学、实字、虚字、活字、死字等。

这部著作试图展现出这些复杂多样的语言学研究历史，介绍几根主线和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当然一些最重要的作者和作品需要更详细的介绍，所以有一些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需要省略。我们的意图是在这门博大的研究中勾勒出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注明最基本的创新成果和方法，将这门学习与当代中国和欧洲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

此著作花费相当多的心思将理论和时代文化背景结合，尊重各个时期的专有术语，并尽可能地给出原始注释。

在介绍每部著作时，本书介绍的是最原始的版本，并且列举了和主题相关的专题性著作。为了向读者介绍得更全面，著作中还运用了汉语和西方相关的历史、语言文学知识。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书的中文翻译方面，得到了王伟、石丛林、刘嘉韵、李芙娜、应超敏、范淑燕、顾力冰等人的大力协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他们不计酬劳、无私奉献，才使本书得以早日问世。

目 录

序

引 言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早期接触——从十三世纪开始

第一节 文化框架 / 1

第二节 早期传教士和旅游者的著作里对汉语的介绍 / 4

第二章 明朝以来欧洲人的初步语言学著作

第一节 词汇学的著作 / 24

第二节 语音学的研究:标音方式 / 31

第三节 中方的反应 / 38

第四节 结论 / 41

第三章 清朝时期的西方汉学

第一节 历史语言学背景 / 43

第二节 双语词典 / 51

第四章 明清以来欧洲人的方言学研究

第一节 欧洲人所编著的研究中国各地方言的著作 / 80

第二节 法国人的汉语方言研究 / 81

第三节 英国人的方言研究 / 86

第五章 明清以来欧洲人的汉语语法研究

第一节 万济国的《官话语法》 / 92

第二节 卫匡国的《汉语语法》 / 98

第三节 马若瑟的《汉语介绍》 / 101

第四节 巴耶尔的《汉语博览》 / 111

第五节 傅尔蒙的《中国官话》 / 113

第六节 马希曼的《中国言法》 / 116

第七节 马礼逊的《通用汉语之法》 / 121

第八节 雷慕沙的《汉文启蒙》 / 125

第九节 江沙维的《汉字文法》 / 133

第十节 巴赞的《汉语口语语法回忆录》 / 136

第十一节 佩尼的《汉语口语和书面语》 / 140

第十二节 贾伯莲的《汉语经纬》 / 143

第十三节 儒莲的《汉文指南》 / 145

第十四节 罗存德的《汉语语法》 / 153

第十五节 在意大利出版的汉语语法书 / 154

第六章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编著的汉语教材

第一节 韦德的《语言自述集》 / 159

第二节 于雅乐的《轶事、小故事和汉语口语妙语》 / 162

第三节 童文献的《中文拉丁语会话》 / 163

第四节 阿贝尔·德·米歇尔的《中文写作》 / 165

第五节 Mouillesaux de Bernières 的《公余琐谈》/ 166

第六节 夏德的《文件字句入门》/ 168

第七节 狄考文的《官话课本》/ 171

第八节 丁韪良的《速成汉语》/ 174

第七章 欧洲人对中华帝国各种非汉语语言的研究介绍

第一节 克拉普罗特的《满文选集》/ 178

第二节 朗格列的《鞑靼满法字典》/ 179

第三节 德·瑟西与维塔列的《蒙古语语法与词汇》/ 180

第八章 清朝末期以后中文的欧洲语言语法书

第一节 中文拉丁语语法书 / 182

第二节 中文英语语法书 / 194

第三节 中文法语语法书 / 196

结语 / 199

附录

一、人名索引 / 201

二、书名索引 / 208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早期接触

——从十三世纪开始

第一节

文化框架

传教士最初接触中国的历史要追溯到 13 世纪,6 名方济各会修士(其中 5 名是意大利人)先后来到蒙古大汗的宫廷,他们是柏朗嘉宾(Giovanni dal Piano dei Carpini, 又称 Giovanni dal Pian del Carpine, 12 世纪末~1252 年)、卢布鲁克(Guglielmo di Rubruquis 或佛兰芒 Ruysbroeck, 1215~1270 年)、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38 年)、Andrea da Perugia、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 1265~1331 年)以及马里诺利(Giovanni dei Marignolli, 又称 di San Lorenzo, ?~1359 年^①)。他们是最早在欧洲流传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报告,如柏朗嘉宾的《蒙古史》和鄂多立克的《东游录》的作者,同时,最早几部西方文献也是由他们其中的几位译成蒙古帝国语言的^②。

第二阶段的接触包括 16 世纪耶稣会会员方济各·沙勿略^③(Francisco Javier 或 Xavier, 1506~1552 年)于 1540 年到达澳门,

① 见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马西尼(Federico Masini)著:《意大利与中国》*Italia e Cina*, 罗马,1996 年。

② 例如由约翰·孟德高维诺译成蒙古语的《新约》和《旧约·诗篇》。

③ 姓名标注取自费赖之(Louis Pfister)的《在华耶稣会士名录》*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 - 1773*, 上海, 1934 年。

1565年耶稣会会员的常驻地在澳门建立。之后1579年、1584年和1587年,方济各会修士、奥古斯丁修会修士和多明我会修士又先后在澳门定居下来。

范礼安,字立山(Alessandro Valignano 或 Valignani, 1539—1606年),1578年9月一抵达澳门,就确立了掌握汉语是开展传教活动必要条件的原则,并要求前来的传教士都受到相应的培训。最早学习中文的三位传教士是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以及法国人巴范济(François Pasio)。范礼安编写了 *Litterae de statu Japoniae et Chinae ab anno 1580 ad anno 1599* (《1580年至1599年关于日本和中国情况的书信》) 以及 *De Chinensium admirandis* (《中国奇妙》)^① 这两部作品。

1583年范礼安在寄给罗马的 *Sumario de las cosas que pertenecen a la provincia de la Yndia Oriental y al gobierno della* (《关于东印度^②有关事情和管理的大纲》) 手稿中强调汉语之对于中国,正如拉丁文之对于各种欧洲通俗语言一样,以力证学习这门语言对进入这一庞大帝国的必要性。正是在他实行“文化调和^③”政策后,耶稣会修士们开始认真学习起了汉语。

罗明坚,字复初(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年),1579年到达澳门后立刻开始学习汉语。后利用葡萄牙商人获准每年两次进入到广州附近做买卖的特许令,第一个踏上了明帝国的领土,并得到当地官员的信任从而设立祭坛。

1582年受两广总督之召,罗明坚与会友利玛窦来到肇庆。

利玛窦,字西泰(Matteo Ricci, 1552~1610年),用中文撰写了无数介绍西方宗教、科学和文化的著作,又用拉丁文及其他西方文字写

① 这其实是 *De rebus Japonicis*, 这部书的一个章节。

② 即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之间的地带。

③ 参考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等作品中的描述,北京,2001年。

下了数目可观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化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最早编写双语词典(见后文)的人。

利玛窦另一项被广泛认可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制定了以下的方针,即若要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欧洲文化,就先须使欧洲文化适应于中国文化。这是耶稣会修士在华活动的一大特点,它被 David E. Mungello 定义为“耶稣会修士的适应”,也正是它促使 David E. Mungello 所谓的“原始汉学”的诞生^①。

在华的一切传教活动的共同前提都是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其结果就是那个时期涌现了大量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专著,尽管它们的价值各异,但它们对那个时代欧洲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不过传教士们在华传教时所采取的两种策略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以方济各会修士为代表,他们坚持以普通大众为工作对象;第二种以耶稣会修士为代表,认为应当多做统治阶级的工作。正因如此,后者经常接触中国上层社会的文化。由于语言学无疑是这种文化的组成部分,耶稣会修士们最后都致力于字典的编纂和音韵学的研究,并大获成功。

耶稣会修士接近中国知识分子,是使中国语言学家更方便地接受欧洲观念之新方法的必要条件之一。例如,我们会看到耶稣会修士的字典中,将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或使用重音符号来标注音调,这些做法,也使中国人认识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些研究至少部分地是为传教事业服务的。因此,传教士们把握着必要的分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圣经》的译文被特别根据不同方言标注了 17 种发音^②。

① 见 David E. Mungello:《奇异的土地——耶稣会修士的适应和汉学的起源》,檀香山,1989 年,页 13—15。这一概念已被 Johannes Bettray 用于描写利玛窦,见 *Die Akkomodationsmethode des P. Matteo Ricci S. J. in China*(《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适应方法》),《格里高利文选》,罗马,1955 年。

②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的“教会罗马字”词条(黄典诚,李乐毅),北京,1988 年,页 227—228。

传教士们在最初阶段对汉语言文字所下的结论是各种各样甚至千奇百怪的,这一点通过他们的旅行报告和信札,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欧洲主要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

第二节

早期传教士和旅游者的著作里对汉语的介绍

在最早的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作品以及书信中,就已出现了对汉语言以及帝国疆域内通行的几种语言的简短描述。Bonaventura Marrani 在他编写的有关卢布鲁克(Guglielmo di Rubruquis)的传记中称此人:

Insuper Sinensium, Tibetanorum, Turcorum et
Uigurorum scribendi modum indagavit.

对汉族人、西藏人、突厥人、维吾尔人的写字方法进行过研究。^①

其实,在卢布鲁克本人所写的《东方行纪》中,就曾强调中国人:

Scribunt cum punctorio quo pingunt pictores et faciunt
in una figura plures litteras comprehendentes unam
dictionem.^②

他们用毛笔写字,把很多具有同一读音的文字都收缩在一个图像里。

孟德高维诺的第二封访华信札中则谈到了蒙古:

Didici competenter linguam et licteram tartaricham,

① 《方济各会研究院》,佛罗伦萨,1929年,第1卷,页152。

② 同①,页350。